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五月黎明



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

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编

亲历者讲述的上海解放历程

解放军指战员、地下工作者、上海市民
各方回忆，披露申城解放与接管真实故事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五月黎明



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

上海通志馆 编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 / 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4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ISBN 978-7-5671-3502-4

I. ①五…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史料—上海 IV. ① K26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9006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装帧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 鑫 钱宇坤

五月黎明

——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

上海通志馆 编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upress.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960mm 1/16 印张 22 字数 311 千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502-4/K · 196 定价 45.00 元

内 容 提 要

1987年,《上海滩》杂志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创办以来,坚持“以介绍上海地方知识和各方面建设成就为己任”的办刊宗旨,坚持用说古道今的方式、生动具体的内容,致力于“讲好上海故事,传播上海精彩”,“让世界了解上海,让全国了解上海,让阿拉了解上海”。所刊登的文章中不乏名家名作、鲜活史料,以及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是“《上海滩》丛书”中的一种,所收录的文章讲述了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斗争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条战线迎接城市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涉及中共领导人对于上海解放与接管的预先谋划与安排,战场上解放军指战员宁愿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以保卫上海完整的英勇无畏,进城后人民子弟兵不住民居、不扰民、甘于睡马路的感人事迹,地下党组织动员党员群众护厂护校、打击敌特、维护社会治安的种种斗争,以及国民党起义人员和上海广大市民对解放历程的点滴记忆。文章作者多为上海解放的各方亲历者,因此其回忆颇具史料价值而显得弥足珍贵。

• 封面题字:王依群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上海滩》杂志主编)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海上潮涌——纪念上海改革开放40周年》

《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

《楼藏风云——上海老洋房往事》

《年味乡愁——上海滩民俗记趣》

《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

《丰碑无名——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纪实》

《海派之源——江南文化在上海》

《城市之根——上海老城厢忆往》

• 责任编辑 陈 强

• 装帧设计 缪炎栩



《上海滩》杂志 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丛书前言



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套四册《上海滩》丛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今年，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新的一套四册《上海滩》丛书，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今年新出的四本书分别是《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丰碑无名——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纪实》《城市之根——上海老城厢忆往》《海派之源——江南文化在上海》。

20世纪的前50年，在中国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二是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三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第四件大事就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此数月前的5月27日，上海已获得解放。而这距今已整整70年。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而且也是名列世界前茅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使上海尽量少受战火的破坏，党中央早有谋划。我们在《五月黎明——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一书中，收录了当年上海军管会财经战线领导、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撰写的文章，回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出的有关“不要让国民党在上海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重要指示但同时强调要有思想准备，“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之后，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

五月
黎明

斗争中，我军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宁愿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上海地下党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密切配合解放军，带路，送情报，同时开展护厂斗争，打击敌特破坏活动，维持社会治安，使上海顺利获得解放。多年来，我们《上海滩》杂志非常重视组织发表有关上海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文章，这次我们精选了其中部分文章，颇具史料价值，尤其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更加弥足珍贵。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而且还领导了隐蔽战线这一特殊的斗争。我们党有一大批信仰坚定、对党忠诚、英勇机智、不怕牺牲的同志，奉党之命，隐姓埋名，有的还背负骂名，忍辱负重，长期潜伏在上海及其他地区的敌人营垒中，冒着随时被捕和牺牲的危险，传递出数不清的重要情报，为抗击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为推翻腐朽的蒋家王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非常敬仰这些无名英雄！由此我们在《上海滩》创刊之初，就非常注意收集发表这类文章，记录这些无名英雄们的非凡事迹。他们极富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吸引了大批读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我们从《上海滩》杂志中，遴选了三十余篇讲述这些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精彩文章，编成《丰碑无名——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纪实》一书，献给广大读者，同时表达我们对这些无名英雄的敬仰之情。

上海解放70年来，受到了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关心，毛泽东同志经常到上海视察并召开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曾经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对上海改革开放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给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以巨大鼓舞；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上海担任过领导工作，而且还于2018年11月专门在上海考察，对上海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还专门询问了上海老城厢的近况，并对旧区改造提出明确要求。不久，李强书记在实地调研老城厢时指出：“旧区改造事关民生改善、事关城市安全，必须高度重视。”上海市政协则组成了以主席董云虎、副主席赵雯为正副组长的课题组，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牵头协调，汇聚各方力量，攻坚克难，以尽快为老城厢待

改造旧区的数万居民改善生活条件、解决拎马桶问题。于是，上海老城厢成为沪上干部群众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上海老城厢是一座千年古城。它由今天的人民路、中华路合围而成。早在唐代，这里就出现了上海早期居民群落，北宋天圣元年（1023）前设征收酒税的机构——上海务，北宋熙宁七年（1074）设上海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上海县。历经宋、元、明、清诸朝，老城厢已经成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到了民国时期，老城厢已不再是上海的中心，但它作为上海城市之根的地位不会改变。尤其是老城厢留下的独特的文化遗产异常珍贵，极富研究价值。它就像一座中国城市发展活的历史博物馆。了解上海，不能不了解老城厢，研究上海，也不能不研究老城厢。《上海滩》创刊三十多年来非常重视组织编发有关上海老城厢的文章，从上海设县筑城，到百业发展；从原先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城内水网纵横、舟楫交通，到填河筑路、运输通畅；从办学育人，到名家辈出……各类文章竟有百余篇之多。此次，我们从中遴选出三十篇左右，编成《城市之根——上海老城厢忆往》一书，以供广大读者和专家阅读研究。

前面在说到上海老城厢的文化价值时，我们自然会想到，老城厢还是江南文化的滋生地，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研究江南文化的重要基础。

江南文化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一样，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滩》杂志组织刊发有关江南文化方面的文章，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创刊以来，《上海滩》组织刊发了数百篇有关江南文化内容的稿件，内容涉及历史地理、人文教育、文学艺术、非遗文化、古镇园林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这次我们特地从《上海滩》杂志中遴选了数十篇有关江南文化的文章，分门别类，编成《海派之源——江南文化在上海》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在此，我们要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去年在他们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的《上海滩》丛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我们希望今年新编的这套《上海滩》丛书，也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依群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上海滩》杂志主编

五月
黎明

目 录

- 1/ 党中央谋划接管大上海
- 12/ 新上海的序幕
- 17/ 陈老总接管上海二三事
- 22/ 华中党校上海队纪实
- 32/ 周而复在上海黎明前后
- 42/ 为了人民的上海
- 52/ 解放上海亲历记
- 57/ 进军大上海
- 71/ 解放军睡马路的幕后故事
- 75/ 解放崇明岛亲历记
- 82/ 长兴岛智取蒋军残敌
- 86/ 金山解放纪实
- 92/ 玉佛寺里的解放军
- 98/ 威震上海的浦东解放军
- 104/ 解放大上海的历史见证——记上海解放纪念馆
- 115/ 张澜、罗隆基虹桥脱险再揭秘
- 128/ 我在上海率军起义前后

五月
黎明

- 130/ 策反刘昌义
- 136/ 代理一天警察局长
- 138/ 义务警察中的党支部
- 143/ 1949：“第六军”在悄悄行动
- 151/ 策反蒋军机动车队
- 159/ 战斗在大特务毛森周围
- 173/ 中共地下组织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
- 181/ 秘密印刷“约法八章”
- 184/ 春潮暗涌迎解放
- 192/ 两幅领袖画的诞生
- 196/ 钱文湘：牺牲在黎明前夕
- 205/ 难忘黎明前的战斗
- 216/ 父母在黎明前被捕之后
- 234/ 我们在黎明前越狱
- 252/ 新上海的神勇卫士
- 261/ 解放上海的最后一战——铁瑛将军谈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始末
- 268/ 1949：中国银行接管纪事

- 273/ 妓女大收容目击记
- 282/ 陈毅批准枪决的军代表
- 290/ 《白毛女》进军大上海
- 299/ 打着腰鼓进上海
- 304/ 二进上海
- 309/ 上海激战三昼夜
- 312/ 台湾归来迎解放
- 320/ 天亮前的小故事
- 323/ 参加学生运动迎接上海解放
- 331/ 蒋介石在上海的最后十天
- 338/ 后记

党中央谋划接管大上海

许涤新

从香港赶赴天津

汽笛长鸣，卓芬及其他送客的人都下船去了，“东方号”离开香港，破浪前进。

“东方号”是只有三千吨的小型轮船，它挂着巴拿马国旗，船中装满了货物。舱内有几个作为旅客居住的小房：靠近船头的餐厅设备相当好，站在餐厅里，就可以遥望海天一色的天际。这次船上的旅客，只有几个人，那就是汉年、我、老夏（夏衍）及其女儿阿谜（现在，她不但结了婚，有了孩子，而且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留校教学，升到教授了），达德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及其夫人，还有两位年轻的越南女青年。潘汉年与老夏父女住在一起，我在隔壁同达德学院的教授夫妇住在一起。那两位越南女青年只在餐厅中见面，她们住在哪一间，我就知道了。

我在离港前一天，把《广义政治经济学》两卷的稿子，交给“三联书店”的史枚同志，但第二卷缺“资本主义总危机”一章。我向老史说明，待我在路上抽空写出。因此，我的简单的行李，除了衣服被褥之外，还带了一些有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材料。卧室很小，没法工作，见到餐厅宽大舒适感到十分高兴，要补写稿子，有条件了。于是，我就利用大家到卧室休息时，埋头把这一章写出来。老潘出来散步时，看见我伏在桌上写书，大笑起来，说我是书呆子。我对他说：“一部书只缺一章，如果不赶快写出来，到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估计会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有时间去搞这一章。此时不写，更待何时？”老潘听后点点头。我在“东方号”上终于把这一章写完了。

五月
黎明

到北平的时候，碰到龚澎同志，我就把这一章的原稿，托她替我带回香港交给三联书店。可能因为工作太忙，她没有把稿子送给“三联书店”。当我跟部队进入上海之后一个月，“三联书店”通知我，本书的原稿已送到上海排印，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一章，还是空白。没办法，只好在烘炉似的工作环境中，咬着牙根，挤出时间，把这一章，再写一次。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书拖到1950年6月才在上海初版出书。

我在“东方号”上用在写书的时间并不多。在饭后，其他的人都回卧室休息了，只有我和汉年、夏衍，经常一面望着餐厅外边的海天景色，一面讲起故事来了。具体谈什么呢？现在不全记起了。汉年谈得最多，我谈得最少，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我的前辈，走上革命的道路比我早，知道的事情比我多；还因为当时我还在考虑“资本主义总危机”如何写法。汉年是在1933年秋进入中央苏区的，他是亲身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亲身经历过艰难辛苦的长征的。他的谈话重点是在批评王明的“左”倾路线，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硬拼干法。他有一次谈到几个去过莫斯科的负责人，听到上海地下组织连续三次遭到大破坏，而农村武装斗争又是如此艰难，曾经提出一种想法，要把党中央搬到南洋，特别是新加坡，从国外秘密地向国内发出指示。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想法，认为这是取消党中央的一种做法；南洋并不太平，南洋并不是不反共，把党中央搬到南洋，那是寄人篱下，使党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离开了中国，脱离了人民群众，又怎能发出正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又说，离开了工农武装，放弃了革命根据地，那是很危险的，只要有工农武装，只要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恩来同志也同意这一意见，认为设在上海的中央局也在两年间遭到三次大破坏，难道把中央搬到南洋就平安无事？这样，要党中央搬到国外的想法就被否定了。汉年在谈话中，对于毛泽东同志是十分尊重的，汉年也谈到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不少好同志，在“肃反”中丧失了生命。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正是对过去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的总结。老夏说的多半是在日本和上海左翼

文化运动中的情况。我谈了自己在上海中央局第三次大破坏中被捕的经过。老潘颇感兴趣，因为那时他已经在中央苏区工作，对上海地下组织第三次大破坏的情况不大了解。每天三餐我们三人都经常在饭后摆起龙门阵来。这次海程实在太有味道：一面看看有时波涛起伏、有时平静如镜的大海，一面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拘束，加上全国解放在望，心花大开。此情此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深深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可惜的是认清了肃反扩大化的破坏性的汉年，在五年后，就被这种破坏性的肃反扩大化所吞噬了！



许涤新（20世纪50年代初期）

我们于1949年4月28日离开香港，5月4日的傍晚，抵达塘沽，一共航行了七个昼夜。到码头来接我们的是冯铨同志。汉年同他是老相识，老夏和我跟冯则是初见面。我们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晨，乘汽车到天津，住在镇南道的原美军招待所。从塘沽到天津的路并不长，但是这条公路的路面，崎岖不平，因而汽车颠簸不止。漫天的灰土，不断地向车里进攻，弄得我们几个人，满头满身都是灰尘了。到了天津镇南道的原美军招待站，才把身上头上的灰尘洗去。吃饭、休息之后，到附近散步，天津的街头是一幅败落不堪的图景。这难道不是国民党的搜刮摧毁所致吗？

听取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在天津住了一天，次日乘火车到了新生的古都——北平。这是我第一次

来到这个经历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封建都城。现在解放了，它将成为人民的都城，它将放射着青春的光芒。

到了北平火车站，冯铨同志把我们送到了弓弦胡同15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汉年和老夏早就同克农熟悉。我同他见面是在皖南事变后的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不但没有一点沉闷的样子，反而是有说有笑，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充满着乐观的“年青”人。一见面，他就和我们紧紧握手，坐下来就大谈起来了。他是闻名的情报工作者，汉年也是情报工作的老手，之所以由冯铨接船并把我们送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处，就是这个缘故。但在我们初到时，却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他像说故事一样，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化了装，小心翼翼地进入北平的。第二次是在1945年冬到1946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就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驻北平的。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这位为党、为革命而深入虎穴的老战士，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我们在李公馆过了一夜。次日李维汉和廖承志同志接踵而至，谈得很欢！他们看见我们从香港带来的芒果，大叫“好东西”，笑嘻嘻地各自把芒果装进口袋而去。在上海马思南路我们就在李维汉的领导下工作。他是相当严肃的，就在会客时，有时大笑也只是一种姿态；在他的脸上见到笑嘻嘻，对我来说恐怕只有在克农同志住处这一次。以严肃出名的维汉同志并不是没有感情。1954年冬他到莫斯科治耳癌，一年之后，他回来了，医生还要他停止工作。在“三年困难”期间，他在休养之余，经常到东四礼士胡同我的宿舍聊天，有时叫孙起孟同志来参加，谈谈对资改造的工作。他的工作经验，他的理论水平，加上他的富有感情的言谈，使我认识到自己过去对他的看法有片面性。

在北京第二天，我们便离开弓弦胡同，住进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汉年住的是303室，我和老夏住在汉年的隔壁，可能是304室。汉年在

我们三人中是头头，因为他对各方面都比我们了解得多。老夏可能好些，而我则感到公事、私事、大事、小事千头万绪。特别是怎样去看望中央领导人，接受他们的指示，这一类公事、大事的安排，我们都请汉年去联系。正如老夏在他的《懒寻旧梦录》里所说：“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他说，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都在香山，工作很忙，所以接见的日期要挤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后临时通知。恩来同志则在城里，明后天就可能约见，所以还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这一天，我先去中央统战部看李维汉同志。他约我过两天参加统战部的部务会议。接着，我到北京市政府去找叶剑英市长。未见到叶市长时，先看到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同志。见到子正，事情就好办了。他立刻把我领到市长办公室去。叶市长一见到我欣然站起同我热烈握手。那时已近中午，他对我说：“看来你还未吃午饭吧，到我家里去。”那时的北平市政府就是现中南海的西华厅；而叶市长的家则在府右街的斜对面。坐上汽车，一下子就到。他叫秘书打电话给柯伯年马上来一齐吃饭。柏年很快就到。叶市长对我们说：“大革命失败，广东的干部损失惨重。我不久就要离京到华南去，干部现在成为我们脑子中的大问题，你看香港有什么人才可吸引到广东来？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广东去？”我说：“方方同志曾要留我在广东，但中央的电报，可能是去上海。到底是否到上海，现在也未完全定下来，因为我同潘、夏二人都未见到恩来同志。”叶市长说：“方方既然留你不住，我也难于勉强。”关于香港能到广州的人才，我就把几位同志，如蔡家荏、古念良、赵元浩、麦扬、陈文川、孙孺和李健行等人，写了一张名单，并写了这些同志在财经工作方面的理论和实际的水平。叶市长很高兴，认为“人才是难得的。你以后如想得起来，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同柯柏年同志在吃完午餐之后，便向叶市长告辞了。

记不起是哪一天（大约是5月9日）的傍晚，我在北京饭店三楼304室看完日报之后，正在沙发上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汉年通知我：“总司令今晚要请我们吃饭，你马上过来；至于老夏，我已派车去接他了。”我到老潘的房子时，克农同志已在，接着总司令就来了。我早就听到这位弃官